



有趣且珍贵的“图书目录”

俞晓群

在我的书房中，存有各种“图书目录”的专书或相关的书，仅就数量而言，大约有数百种不止。阅读频次，也大大超过我对于其他门类图书的抽取。究其原因，对我而言，无外乎三点：一是就书房或图书馆而言，现实空间的存书数量是有限的，谁都无法实现无限存储，怎么办？解决方案之一即是收存书目，比如《四库全书》规模极大，鲜见私藏，但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收存书目是一种虚拟藏书，更是一种智慧的存在。阅读书目是学术正途，也是必由之路。二是有背景、有传统的出版社，只要时代允许、管理到位，都会编撰本公司总书目、大事记、回忆录等。有选择地收存它们，记录一个时代的书业信息，非常重且有趣。三是读书目、存书目、研究书目，是一个出版人的职业训练，也应该成为读书人的生活习惯。比如出版人参加书博会，标志性的动作是入场后先收集书目，晚上开始一本本研究，标注笔记，第二天按照研究结果去选书谈版权。其实读书人参加书展也同此理，他们也会按照类似的流程选书找书买书。

我本人以出版为终生职业，几十年与书为伴，逐渐形成了上面的认知。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特殊偏好，那就是为我任职的出版公司编书目，有总书目、存书目、可供书目、分类书目等等，以此来完善企业的资料库，供研究选题时使用。即使在我离职的时候，公司为我编撰一部纪念集，题目正是《人文书目》，收入我任职时出版的好书书目。

言归正传，下面略记几种我喜爱的书目。

亚东图书馆书目。我是在汪原放的回忆录《回忆亚东图书馆》中，读到亚东图书馆书目。此书由学林出版社1983年出版，2006年再版时改名为《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亚东图书馆成立于1903年，是由安徽绩溪人汪孟邹创办的出版社，身后支持的名人有陈独秀、胡适。1953年亚东图书馆停业。50年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很多好书，比如首次标点中国古代名著，最早出版《胡适文存》《陈独秀文存》等。《回忆亚东图书馆》书前有王子野序言，早年王先生的父亲健行曾在亚东图书馆工作，参加过校点《缀白裘》。后来王子野在亚东图书馆学徒，从

此爱上了出版事业。1950年后他担任人民出版社主要领导，成为一代出版大家。1993年钟叔河去北京见到王子野，王先生说：“现在印古典小说很多，但都是辗转重印，走二三十年代上海滩上一折八扣的路子；那时候，只有亚东图书馆印小说是严肃认真的。”此后钟先生组织出版“亚东本古典小说”16种。前些年我去长沙拜见钟先生，他还对我说，不能忘记亚东图书馆等出版前辈的工作，许多事情我们可以继续做下去。此后才有了草稿策划出版的“亚东版中国古典名著系列”陆续面世。时光流转，亚东图书馆久已不在了，但他们的精神还在，他们的书目还在，他们依然在为我们串联起一代代文化传承的故事。

郑振铎书目。即《西谛书目》，两册精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出版。书前有郑振铎公子郑尔康写的“新版序”，他谈到1958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不幸去世，留下许多藏书，不少旧书店愿以天价全数收购。但郑振铎生前说过：“我的这些书将来都是国家的”，因此家人以此作为他的遗愿，将这些书全部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文化部按照承诺建立“西谛藏书室”，并于1962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西谛书目》，当时只印几百部。直到40多年后《西谛书目》才重印，但此时“西谛藏书室”早已不复存在。如今又有20几年过去，私家能够存留一部《西谛书目》，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

近代汉译西学书目。《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张晓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夏晓虹作序《“西学东渐”的如实记录》，她记到1896年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三卷，1897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十五卷，1899年徐维则编《东西学书录》二卷，三年后顾燮光编《增版东西学书录》四卷等等。夏晓虹还谈到本书编著者张晓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是赵祖谦教授的夫人，此前任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我收存的这部《书目提要》毛边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位出版同人寄送给我的。如今书中还附着一封信写道：“俞老师，冒昧给您寄书，想必也不失为一桩小小的雅事。因为经常在报章上读到您的雅作……前些日子又有一篇关于毛边书的文章，颇为有趣，特奉上一册

供您批评，文中诸君若喜欢，请让他们直接联系我。”

四家出版社书目。这四家出版社是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它们是中国出版的重镇，因此对于它们的书目我格外重视，但收存不全，略述如下：一是《三联书店图书总目录增订版1932—2007》，2008年正式出版。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书目，内容丰富，差错率低，编排科学规范，具有研究性。三联书店的历史沿革本来就很复杂，分分合合、生生灭灭，能通过一本书目捋出头绪，实在让我敬佩。还有一本《三联书店大事记上册1932—1951》也编得极好，不过它只是“一只断尾的蜻蜓”，写到1951年就没有了，甚是可惜。二是《人民出版社总书目1949—2021》非正式出版，我在旧书网上购得。洋洋五大卷，大开本，让人震撼。尤其是每年都有出版物的记载，形式上看，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工作没有发生过断裂，其维系之产品更让人难忘。三是《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1987年正式出版，我有收存。书前“编辑说明”称，1982年曾编《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49—1981》，此书目我未收存。四是《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949—1980》，非正式出版物，两册封面一蓝一红，书前扉页上钤有“商务印书馆建馆八十五周年纪念”印章。

商务印书馆是百年老店，我格外喜欢这个品牌，相信它的出版品质，存有的史料最多，有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还有多部《纪念文集》。对于其中的优秀人物如张元济、王云五等人，我写过多篇研究文章，还撰写了《中国出版家王云五》《现代中国出版前夜——鲍家的故事》等著作。我还存有商务印书馆的几本小书目，非正式出版物，如《丛书集成初编目录》，目录后附有“新闻纸本样张”。再如《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目录》《万有文库第二集目录》，装帧与《万有文库》相同，书目后也附有几本新书的样张。这些书目是我在上海一家古旧书店中买到的，书内还插着一张此前收藏者的卡片，上面注明批判《增广贤文》用，还记有两段批判内容，一是一“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再一是“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家中无才子，官从何处来。”

读到——记忆的江河

李海卉

老宅的书房内，刘梦溪先生正对着学生讲述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太平洋另一端，何谷理教授则拿着放大镜，仔细探究明末小说中隐藏的密码。这正是两位学者探索中国文化的不同方式，刘梦溪先生的《观乎人文：东塾人文讲谈录》（以下简称《观乎人文》）和何谷理的《十七世纪中国小说》，就像两个不同角度的镜头，拍下了同一座文化大厦的不同侧面。

《观乎人文》读起来，像是坐在一位慈祥老先生的书房里，听他娓娓道来。刘梦溪是典型的中国学者，他的学问扎根于传统，心系着中国文化的根脉。他讲的不是死板的知识，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刘梦溪特别强调“闲适阅读”。在他看来，真正的好书不应像教科书那样读，而是要泡杯茶，找个舒适的角落，让文字自然地流入心里。而大洋彼岸的何谷理教授，则完全是个“文学侦探”，他的《十七世纪中国小说》不是在讲述，而是在解谜。他对十七世纪中国小说的研究，就像在破译那个时代的文化密码。

两本著作分别从不同视角展现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入探索。《观乎人文》收录了刘梦溪在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机构的30余场演讲，系统呈现了一位当代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价值的深度思考。作为中国文研所创所所长，刘梦溪在书中围绕三个层面展开：阐释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稳定性价值理念；梳理王国维、陈寅恪等近现代学术人物的思想脉络；探讨个体如何通过读书与修身实现人格成长。书中关注了近现代知识分子如何在文化断层中传承学术命脉。他提到王国维在学术上的多重转变；从西方哲学研究转向宋元戏曲，再转向古史、古文字和古器物研究。这种转变既是个体学术探索，也是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

《十七世纪中国小说》是美国汉学家何谷理的代表作，初版于1981年，如今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这部作品填补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一段空白，聚焦于《水浒传》到《红楼梦》之间的“中间时段”。何谷理的探究更多从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的视角切入。他在书中分析了《西游记》《隋史遗文》《隋唐演义》等作品，指出了这些小说是儒家文人用以陈述个人表达和观念申明的严肃文学形式。

何谷理在《十七世纪中国小说》中颇具启发性的章节之一是“梦忆往昔”。何谷理在这一部分深入分析了张岱等文人如何通过文学创作治愈心灵创伤。他认为，张岱的《陶庵梦忆》不仅是对逝去繁华的怀念，更是一种“精神生存的努力”。张岱在梦中构建“琅嬛福地”，寻找“更为沉静有序的思想状态”。

读这两本书，最动人的是那种“记忆的抵抗”。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道，他常常做梦回到过去的时光。那些关于西湖的月光、南京的灯火、苏州美食的记忆，就像一部部小电影，在他的脑海中反复播放。何谷理认为，这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一种精神回归——在记忆中重建一个家园。同样，刘梦溪对国学大师的反复讲述，也是一种记忆的传承，探讨个体如何实现人格的成长，以此，构筑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多元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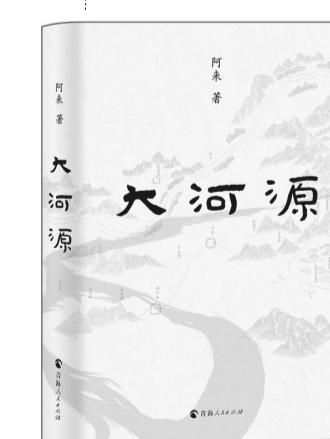
荐书

生命的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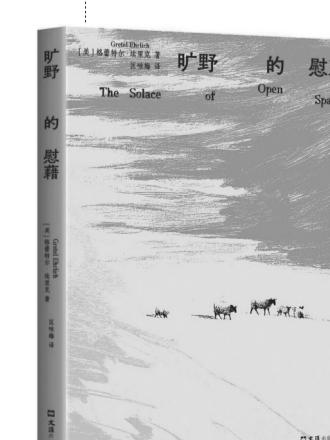
《历史中的大与小》
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家马伯庸的这本历史随笔集收录了他过去十年写的文章。其中有马伯庸陪孩子读古文名篇的亲身经历，有牙疼时为转移痛苦而总结的古人牙疼史。马伯庸说，如果历史有锁孔，好奇心就是那把金钥匙。这些文章就产生于充沛、纯粹甚至有点过剩的表达欲与好奇心。



《大河源》
青海人民出版社

作家阿来的长篇非虚构新作《大河源》带读者走进黄河源深处，状写出黄河源的前世今生。作品既总括黄河源的自然状况，又以小说笔法强化叙述的文学性；作家反人类行为，直面生态问题；在讲述神话传说历史的同时，兼顾硬核科学知识，堪称一部关于黄河源的百科全书。



《旷野的慰藉》
江苏人民出版社

格雷特尔·埃里克是美国旅行作家，这部随笔集收录了作家对怀俄明州这片土地的记录和情感。1975年，作者前往怀俄明州拍摄纪录片。拍摄期间，伴侣患病去世，她踏上漫长的疗愈之旅，生、死、日常和季节的叙事线在这里清晰可见。作者从这堂无常之课中懂得：失去也是一种奇怪的充盈。

重溯王逊的学术人生和美术史学的启航

王 鹏

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的星图中，王逊曾是一颗光芒强烈的星辰。2025年，为纪念其诞辰110周年，一部名为《上水船：王逊与现代中国的艺术理想》（以下简称《上水船》）的学术评传出版，将一个有血有肉、思想勃发、在时代激流中奋力划桨的学者形象，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上水船》一书并非一部简单的生平列传，它建立在作者30余年“美术史的考古学”般的史料辑佚工作之上，于旧书市、档案馆、故纸堆里抢救出约300万字的遗著，编纂成《王逊文集》《王逊年谱》等基础文献，正是这种扎实的史料根基，使得《上水船》得以超越一般的传记书写，成为一部“通过王逊的学术

人生，折射出20世纪现代中国艺术理想宝贵遗产”的厚重之作。

王逊的艺术理想，其根系深扎于蔡元培大力发展美育的思想沃土。书中清晰地勾勒出王逊学术思想的脉络：他追求的是“中西融合”的学术视野、文化复兴的现实关怀，以及美善合一的精神境界”。这在他具体的学术与事业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1957年，他主持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此举不仅为一个学科建制，更是试图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系统整理研究文化遗产，开创现代形态的中国美术史学科体系。他的美术史研究，明确从玉石、彩陶、青铜器讲起，将工艺

美术提升到与士大夫书画传统同等重要的地位，打破了以往“书画史”即“美术史”的狭隘格局，体现了其“一切艺术趋向美玉”的广阔视野与整体史观。尤为动人的是《上水船》对王逊参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工艺美术改造实践的细致还原。这部分的记述，让一个学者的理想从纸面走进了火热的生活现场。上世纪50年代初，面对国家的经济困难与西方封锁，工艺品出口成为换取外汇的重要途径。王逊与林徽因等学者一道，深度投入诸如景泰蓝等濒临传统工艺的复兴与改造中。他总结出的“好看、好用、省工、省钱”八字设计原则，看似朴实无华，却蕴含着深刻的现代设计理念与民生关怀。它成功地将传统工艺从“乾隆式烦琐”的贵族审美，转向简洁实用的现代风格，既保留了民族精神，又赋予了其服务当下生活的生命力。书中重现了1953年“全国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的筹备细节，更是展示了王逊如何将学术研究、田野调查与国家文化建设紧密结合。他参与工艺调查、展品遴选、编订目录，实质上是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文化资源普查与激活，将散落的民间技艺整合为“文化生产力”，完美诠释了“学术作用现实”的深刻命题。

本书的珍贵之处，在于它通过大量稀见的书信、履历表、会议记录等“活生生的资料”，让我们“看到一个有呼吸的、有脉搏跳动的真人王逊”。

走进百年老宅的园林式叙事迷宫

刘梦泽

“梦思”，这一命名在历史和空间上为作品赋予了厚重的气质。

《江山故宅》的核心情节是一场“寻宝”之旅，主人公言子陈作为古建筑专家，为完成“已毁古建筑群现状评估”课题回到苏州，却意外卷入对家族故宅“不易堂”的寻找中。小说的叙事动力源于一封1975年的海外来信，信中提及的古画《春日家宴图》与言家老宅“不易堂”相关联，寻找这幅画作和不易堂成为几代言家人的执念。

悬念与不确定性贯穿始终：小说中的古宅“不易堂”似乎永远处在“已毁”与“尚存”的模糊状态中。言子陈收到街道通知称老宅需要办理拆迁手续，但她在苏州的兄妹却坚称该宅早已不存在了。这种不确定性正是范小青故意营造的叙事效果，她在小说中多次使用“说书”手法，以苏州方言中的特殊含义——“说书”指一个人的讲述是不可信的、夸张的——来强化这种不可靠叙事。小说最后，主人公言子陈发现，“也许从来就没有传说中以及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春日家宴图》。”这种不完整性、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恰恰是作家的创作理念。《江山故宅》在结构上体现了范

小青作为“小说工程师”的精巧设计。她曾自陈“很刻意地造了迷宫，使得小说本身有一种设计感和工程感”。

小说的整体结构分为五个部分，两条线索一明一暗、分头并进又彼此交织。这种结构安排如同苏州园林的布局，既错落有致又相互呼应。范小青笔下的园林不仅是故事的背景，更是历史的见证者。清末民初的园林里，窗棂的雕花映着家族鼎盛时的宴饮；战乱年代，园子里的一池碧水照见过离散的泪痕。刺绣作为书中的“魂”承载着深厚的情感内涵。无论是少女为心上人绣的荷包，还是战乱时带出的家族信物，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放不下的责任，都被织进了丝线里。评弹堪称作品的“韵”，评弹的调子贯穿始终，茶馆里的艺人唱着古今故事，调子婉转时，映着家族安稳的日常；唱腔悲切时，伴着人物的坎坷遭遇。这些文化符号不仅是地域特色的展示，更是精神价值的物质载体。范小青通过具象的老宅，呈现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着重描写了人类生命的双重世界。

《江山故宅》的人物塑造突破了传统的关系框架，展现了跨越阶层的情义纽带。言家与其管家余家的缘分已经超越

了传统的主仆关系，成为代代相传的承诺与信义。小说中最感人的是普通人对承诺的坚守。当余桂芬承诺帮助言家寻找不易堂时，这个承诺就成为余家代代信守的诺言；老朱为了找到那幅传说中的《春日家宴图》，不惜散尽万贯家财。范小青通过这些人物的选择，展现了中国文化中“重情重义”的深厚传统。这种情义不是口号式的表达，而是融入日常的相处里，危难时的援手间，代代相传的家风中。

当古宅“不易堂”最终未能被找到，当《春日家宴图》始终若隐若现，当言子陈结束她的寻根之旅时，她最终领悟：“即便物质的它不在了，但是因为它曾经存在过，它会留下痕迹，留下许多许多的信息，这样的信息，不会消失，它们会一直传到后来、再后来。”

《江山故宅》不仅是一座苏州古宅的百年故事，更是一幅传统文化精神的地图。范小青试图用这部作品告诉读者：物质的宅院或许会消逝，但其中承载的忠诚、信义、情义与文化记忆，将在时间的河流中永恒流淌。这座古宅不仅是言、余家人的精神家园，而且是千年古城的文化缩影，更是中国人“重情重义”传统的象征。



作家范小青的长篇小说《江山故宅》以苏州古城为背景，巧妙融合苏州古建、园林、刺绣、评弹等文化符号，通过言、余家两大家族跨越百年的兴衰变迁过程，勾勒出一幅江南文化的精神图谱。小说标题“江山故宅”源自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二）》中的“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